

民国旧体诗史稿

胡迎建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旧体诗史稿/胡迎建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5. 11

(江西社会科学研究文库)

ISBN 7 - 210 - 03246 - 0

I. 民... II. 胡... III. 诗歌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民国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0227 号

民国旧体诗史稿

胡迎建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

字数: 460 千 印数: 1 - 3000 册

ISBN 7 - 210 - 03246 - 0/I · 428 定价: 36.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 330006 传真电话: 6898827 电话: 6898893(发行部)

网址: 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钟书

繁荣社会科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发展和繁荣的过程。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着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集中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社会科学的生命在于创造，在于创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新的世纪，新的千年，呼唤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呼唤着社会科学研究的突破和创新。换言之，没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突破和创新，也就没有社会科学真正的发展和繁荣。理论贵在创新，创新需要勇气，需要智慧，需要执着的追求和艰辛的探索；理论重在创新，创新需要有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理论功在创新，只有创新的理论成果，才能探索规律、把握规律，才能启示实践、指导实践，才能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坚持理论创新，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使命。

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

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新世纪的世界,新世纪的中国,新世纪的江西,许许多多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许许多多的政治、经济、社会课题,迫切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去解答。社会科学工作者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江西向为“文章节义之乡”,素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著称。在历史的长河中,江西不但涌现出许多名扬中外的文学家、艺术家,而且涌现出不少影响古今的学问家、思想家。但是,我们不能沉缅于先哲的辉煌,而应该创造更加璀璨的未来。江西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一直在为此努力,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世纪之交,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江西省社联大力实施“精品战略”,积极组织和扶持社会科学精品力作的撰述和出版,其实现形式是:推出“江西社会科学研究文库”工程,每年拿出一笔事业经费,资助出版 10 本理论上的厚重之作。这是我省社会科学界的一件大事、好事、实事,如此年复一年,坚持下去,必将蔚为大观。

21 世纪,将是我国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也将是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世纪。江西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大家努力啊!

祝愿社会科学研究的精品力作不断问世。

民国时期旧体诗概述

旧体诗在民国时期,经历了一个驼峰状的曲线,即由初期的高峰跌入低谷,然后在三十年代初复苏,在抗战至解放战争阶段更得到复兴,进入其高峰期。现在分阶段叙述,每段之前,略述时代背景。

第一节 旧体诗流派纷呈(1912—1917年)

清末,由于朝政的腐败无能,人们迫切盼望变革社会,要“提起寰球烘白日,掀翻苍海洗青天”(温朝钟《答王克明》)。在无数志士的努力下,终于推翻了满清统治,迎来了民族共和的春天。潘飞声的诗说:“重悬日月照山河,新岁新晴入醉歌。一笑陈抟坠驴背,唐虞世界说共和。”(《壬子新岁作》)丘逢甲参加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有诗云:“郁郁钟山麓气腾,中华民族此重兴。江山一统都新定,大纛鸣笳谒孝陵。”(《谒明孝陵》)这些都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推翻皇权、共和肇兴的喜悦心情。民国成立,结束了封建社会的皇权政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当

中央集权的政治重心既失,便形成了南北两大政治力量;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在南方集结力量,力在护法,组织护国军政府,反对袁氏独裁;而袁世凯则在处心积虑玩弄权术,图谋建立帝制。梁启超曾进入过袁世凯政府,但他后来识破了袁的野心。蔡锷接受他的指示,在云南起兵讨袁,人们赋诗言志:“绝壁荒山二月寒,风尖如刃月如丸。军中夜半披衣起,热血填胸睡不安。”(《军中杂诗》)抒其挥刀杀贼之志。不久,袁世凯众叛亲离,在民众的一致反对声中去世,结束了帝制的美梦,历史进入了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民国初期的诗是清代以来诗歌发展的结果与接续。向前追溯,具有千年传统的古典诗发展到清代,形成尊唐与宗宋两大派。唐诗以情韵胜,雄浑而丰腴;宋诗以理趣胜,说理深透而有骨力。自道光年间宋诗运动兴起,迨至晚清,形成影响甚广的同光体。诚如陈声聪在《苏堂诗拾序》中说:“予尝评价清同光间诗人,以为自宋以后数百年,诗之美盛极于此际。学者各尊其薪向,而尽其瑰奇,一扫剽贼肤廓之弊,诗之境域寔广矣。”认为这是自宋以来诗歌发展到最为美而盛的阶段。同光体诗人往往偏重于将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结合起来,体现了渊雅的书卷气。入民国后,前清官吏出身的诗人失位赋闲,他们能将诗艺提高到新的水平,但同时又由于观念、意识的落伍,诗多苦语,哀心所感,多嗟杀之音。由于接受了积淀得越来越深厚的传统文化,旧典生僻,造句生涩,寓意隐晦,使诗呈现出狞厉深奥之态。这就为民国时期的旧体诗如何蜕变提出了一个沉重的课题。

此时的旧体诗仍为文学正宗,是文人最乐于言志抒怀的工具,而又不似过去的士子,练习做诗多是为了去应试科举。皇权政治的消失,为诗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反映新时代的前景。“共起民军义,重生祖国光。黄衣犹可接,不独继成汤。”(释敬安《田君梓琴赠诗再叠前韵奉酬》)“金瓯永奠开天府,沧海横流破天荒。雨足万花争覆雪,烟消一碧日回翔。”(吕碧城《民国建元喜

赋一律》)这些诗句表达了人们对欣欣向荣的开明社会的向往(虽然后来并未如此)。新生代的知识分子,背离了传统的封建士大夫的既定人生轨道,从家族伦理关系的锁链中挣脱出来。诗人们认为世界在更新,诗也应该顺应社会的发展,别开天地,以新风味、新意境、新格调,反映新追求、新希望、新的人生选择。诚如吴芳吉所说:“余以民国之诗,当有民国之风味,以异于汉魏唐宋者,此格调之不能不变者。处今之世,应有高尚优美之行,适于开明活泼之际者,此意境之不能不变者也。”(《白屋吴生诗稿》自叙)表明具有前瞻眼光的诗人们有着开一代诗风的希望。他们在诗艺上或不如老一代遗民诗人高,但自有一种蓬勃气象。

朝代更迭之后,清官吏成为遗民,少部分转人民国政权中任职,有的侨寓上海、北京、天津、青岛等地,更多的是退归故里终老。他们往往哀叹“故人各各风前叶,秋尽东西南北飞”(赵熙《题石遗诗话后》);“乱馀还念惊弓鸟,国变真如失树鸦”(释敬安《俞恪士归自寸言……俱侨寓沪上,相见各述乱离》);“满腔心事乱于丝,欲挽东君力不支。卦画溪山谁作主,蓍蓍风雨竟如痴”(俞钟颖《壬子送春原唱》);“形质虽存非复我,江山信美不如初”(陈锐《次韵再赠病山》)。这些诗句形象地表明了他们飘零的处境与凄迷的心境。他们的传统文化素养较高,又有较充裕的时间从事诗歌创作与研究活动,并取得较高的成就。如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中说到于晦若“侍郎辛亥前绝少作诗”,《晚晴簃诗汇》说到郭曾炘“辛亥后始致力于诗”,即说明遗民们好以吟诗作为晚年生活的慰藉。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回忆清朝史事,如《桂堂清故言词》《颐和园杂题》《东陵纪事诗》之类的诗作尤其多,或惋惜或哀叹,怀旧气息相当浓重,也有不少是检讨清末政治的腐败。他们往往结社榷集,编刊唱和,切磋诗艺,期待着诗运的中兴。一九一二年三月,瞿鸿禨、缪荃孙、沈曾植、陈三立、郑孝胥、李瑞清、樊增祥在上海樊园成立超社(后改名退

社)。当年重阳,释敬安邀约陈三立等人在静安寺雅集。次年春,樊增祥邀樊鼎芬、陈三立等人连日斗捷,王癡运也来到愚园,众多诗人到场赋诗,或樊园探梅,或祝东坡、山谷生日,赋诗唱和,辑有《樊园五日战诗纪》等。诚如陈三立所说:“迨国骤变,大乱环起,四方人十曾生平相识亲旧,类群地蜀集沪上。居久之,无以遣烦忧,始纠侪辈十许人,时开联诗社。”(《书善化瞿文慎公手写诗卷后》)一九一三年,梁启超在北京万牲园大宴宾客,到者二百人,多为清末官吏,酒后作诗或打诗钟。厦门原侍郎林菽庄在鼓浪屿结菽庄吟社。有的遗老热衷于作诗钟,这种风气在沿海地区,尤其是在上海、福州等地盛行。贵州李独清在《诗钟会》一诗中说:“往昔何曾见,近年始创行。可观原小道,适意遣闲情。觚棱悲旧梦,笔砚托余生,仿效多贤达,流传遍沪京。”即说明清遗民乐于采用的这一形式与他们的生活处境、思想感情的关系。这便是所谓的名士风雅。遗民创作与结社活动确实为诗坛带来了痛苦的“繁荣”,诚如同光派领袖陈三立在《俞觚庵诗集序》中说:

这一段话委曲而悲哀。陈三立将清朝灭亡、民国兴起视为天纪人伦的灭绝,当然是非常落后的认识,但他认为内心的凄苦悲愤,可使诗歌更好而且更盛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程颂万也有同感,赋诗云:

严》)

即此或可窥见这一阶层诗人们的心态。确也有一些遗民诗人喜欢堆砌不当的词语典故,感伤时世。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对此作了批评:

其实,此类遗民与宋明遗民有很大不同。在他们年轻时,已目睹欧风美雨对中国的侵袭,对世界大势有了一定的了解。清政府的垮台,实是意料之中;而民国政权对遗老也并未进行迫害。这与宋、明遗民面临的是异族入主中原的惨痛现实是不同的。也有的遗民能与时俱进,如做过清官吏的许承尧就很反对一姓再兴,主张共和。胡先骕曾将清末民初文人分为五类:一是泥古不化的,反对一切新事业者;二是清季的所谓清流,以为中国必不能墨守成规,必须改革,但认为颠覆清室是不道的,如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赵尧生等;三是不以清室颠覆、民国兴起为天维人纪坏灭之巨变,但以流人遗老终其身者,如俞明震等;四是奔走革命、誓覆清室者,如章太炎等;五是依凭名士头衔,猎食名公巨卿间,沉溺于声色,托词于醇酒妇人,如樊增祥、易实甫等。(见《评〈俞恪士觚庵诗存〉》)这五种人除第四种人外,都是曾在清朝廷中做过官的遗民,他们在社会剧变后的思想与行为实在有很大差别。

民初诗坛受清中叶以来诗派影响,崇尚不同,故也颇有诗派之遗风。主要有:一、中晚唐派,以樊增祥、易实甫为首,崇尚中唐以后的唐诗;二、汉魏诗派,一称湖湘诗派,以湖南王震运为首,标榜学汉魏诗,以为汉以后诗不足观,重在模拟。著名思想

家章太炎的诗歌主张与其大体相同,只是其思想内容不同,前者崇尚帝王之术,后者主张民族民主革命;三、以江苏常熟张鸿、汪荣宝为代表的吴门西昆派,学宋初西昆体,上溯李商隐;四、清末形成的诗界革命派,其首领康有为、梁启超仍活跃在诗坛,但无复当年豪气,主要传人有金松岑,偏重于浑雄豪宕;五、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同光体,其中主要有以陈三立为首的赣派、以郑孝胥为首的闽派。

同光体诗人大多为胜朝遗老,他们以其纯熟高超的诗艺,屹然为一代宗师,为人尊仰,影响了一大批人。据福建施蛰存、贵州李独清回忆,他们在年轻时都曾爱慕并模拟过陈三立的诗。潮州石铭吾认为潮州一向宗唐音,但后来这一带诗人均受同光体影响。胡适也曾认为“这个时代之中,大多数的诗人都属于宋诗运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但后来胡适、陈独秀发起文学革命,却将模仿古人当作同光派的病根所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征引陈三立赠给沈瑜庆的诗“涛园抄杜句,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秦刀”之后说:“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其实“摹仿古人”何尝不是同光体诗人力求避免的,他们涉俗恶熟,博奇执怪,便是为了抵制与逃避中国诗的固有意境与模式。至于末流,没有这样的功力与阅历,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便被人抓住话柄。另外,胡适虽反对模拟,但他好以文为诗,何尝不是受宋诗的影响呢?而他认为其同盟者陈独秀也“是学宋诗的”(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不过,此派偏重于将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相结合,体现了浓厚的书卷气。用典使事,甚至取自佛典(如沈曾植),晦涩难懂。而同光体后学的缺点在学古而不善变化、格局不阔、题材狭窄、过于雕琢字句,陈陈相因。汪辟疆在《光宣诗坛旁记》中说:

林学衡也表述了类似的意见,他在《今诗选自序》中说:

这一段话对同光体末流不无贬责之意,然而从另一方面说明当时竞相学同光体诗的现状。的确如此,如湖湘派中的曾广钧、陈锐,江苏西昆派中的周述以及诗界革命派中的潘博等都曾受到同光体影响,改宗宋诗。陈仲陶初从王湘绮游,后改师陈散原,自称湘绮叛徒。同光体宗宋诗,乃是为克服诗之肤浅浮泛而力求思致深刻。清末民初文人的心态多是穷愁抑塞,宋诗枯硬危苦的风格,符合这一类人的审美趣尚,所以同光体诗风主导诗坛,确并非无因。

还有成立于清末、在民初迅速发展的南社,人数多时上千人。领导人柳亚子等试图扫除同光体影响,“思振唐音”,有意提倡盛唐之音。他们与诗界革命派有一定的联系,同样主张将新名词、新精神融入诗中,但更偏重于政治变革。他们频繁举行雅集活动,出版《南社丛刻》,为年轻一代人所瞩目。南社以年轻一代诗人为主,富有朝气,是一个带政治性的团体而不是因诗风旨趣一致而结成的诗社,后来在是否应该学宋诗、是否反对同光体的问题上发生分歧,最终陷于分裂而解体。南社中的主流派是以柳亚子为首坚持宗法盛唐诗歌的一批诗人,他们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以文章节义相砥砺。钱基博在《现代中国

文学史》中评他们的诗“多愤世嫉时，慷慨悲歌之作”。但多数诗作浅薄，流于空洞叫嚣，艺术上直泻无余，用典用词落入了新的范式。其非主流派而诗歌卓有成就的却是黄节、诸宗元、胡先骕、林庚白等宗宋派，他们的诗风与同光体相当接近，说明在“黑振唐音”的同时，出现求峭僻以避俗的另一走向。也有人主张不必崇唐宗宋，要自创一格。如马君武《寄南社同人》所宣示的：“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但否定了继承，忽略前人积累的丰富经验与技巧，那也将成为无本之木。

还有更多的诗人对社会与时事予以关注并力图反映到诗中。如林纾就曾以诗描叙了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纵兵焚掠北京、天津的事实，其背景是袁氏借口北方不靖而不肯到南京就职却要在北京建都。关心国事的传统直接影响了其后刘成禺创作的《洪宪纪事诗》二百余首，刻画了袁世凯复辟称帝的丑态，因而传诵一时。

当时在袁世凯政权与后来的北洋军阀政府中，也有一批文人诗人造诣较高，如做过平政院院长的周树模、参议罗福颐等。就连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也工诗，当其父谋划称帝时，他作《明志》诗以讽谏：

（此按最早版本）

此诗被称为“历史中有一位置的一首诗”，末联两句尤为传诵一时。

一批年轻诗人跃登诗坛，如辛亥革命党人朱执信、胡汉民，南社中诗人黄兴、于右任、汪精卫、叶楚傖等，同时又是早期国民党的骨干，虽然他们的主要精力用于从事实际工作而不仅是写诗。还有急欲变更现实、改造中国的激进者如李大钊、林伯渠、

毛泽东、周恩来等,早年的诗都吐露其宏阔的胸襟与抱负,后来大多成为共产党领导人。

民国初期,还有上海周梦坡续办春音诗社,参加者有朱祖谋、袁世虎、曹君直、吴梅、陈匪石等。顾家元在上海创立丽泽文社,请沈曾植、郑孝胥等为爱好诗词的青年讲授诗学。各地承前代流风余韵,仍有结社撰集、作诗吟诗的风气。其他如臧宜生、江石溪在扬州成立冶春后社。云南丽江乡缔结为桂香诗社。一九一六年在四川泸州,滇军将领朱德、赵又新、陶开水与地方士人结振华诗社。聚会频繁,如一九一五年在南昌举行吟潭诗会,上海徐自华举行消寒诗会。

总之,此期间由于流派的众多、思想意识的多元化,传统文化“仅仅剩此一脉”的“国粹”呈现了短暂的繁荣,诗人如云,诗作如雨。不过,流派之畛域已渐模糊,庶民们的共同命运促使他们互相交往与影响,学唐也好,学宋也好,学汉魏也好,不过是某一偏好,更多的人追求出唐入宋,会通百家,形成不同的面目。诚如沈瘦东论当时诗人风格时所说:

(樊增祥)

(郑孝胥)

(陈宝琛)

(赵熙)

(吴昌硕)

(钱振铎)

(瞿鸿禨)

(李拔可)

(陈曾寿)

(金松岑)

(转引自郑逸梅《艺林散叶》)

一九一二年,陈衍应梁启超之请,在《庸言》杂志连续发表《石遗室诗话》,一九一五年改在李拔可主编的《东方杂志》发表,一九二九年在《青鹤杂志》上发表续编,为同光体诗人扩大了影响。

第二节 旧体诗的被冷落(1917—1927年)

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死去,随之而来的是北洋军阀政府长达十年的统治时期。北洋军阀以战争为手段展开了权力的角逐,从而战祸频仍,南方各省军人拥兵自保,割据兼并,使此期间政局更为扑朔迷离,诚如余若琮诗云:“拥旄割地擅强梁,百样诛求各主张。”(《漫兴》)军阀割据,征求无厌,战争不休,贼寇兵燹,民无宁日,加之外强窥伺,中国陷入更大的动乱。诗人的眼前出现“烽烟黯淡三边日,风雪飘摇五族旗”(谢良牧《人都志感》)的惨黯前景。

10

这一期间,以胡适、陈独秀为先驱,以《新青年》为阵地,掀起新文学运动,这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大事。一九一八年一月《新青年》四卷一号发表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人的白话诗,标志着新诗开始与旧体诗分庭抗礼。其时因中国人内受专制之余毒,外受列强之侵凌,终于在一九一九年爆发了由学生发起的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旧有的文化既已渐次破坏,各种救国主张与学说便纷纷出现并趋于活跃,与西方的进一步交流,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也拉开了东西方文化之争的序幕。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其直接的影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开始传播。共产党成立,成为日后中国政治舞台上与国民党既合作又斗争的最重要的一支政治力量,昭示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有鉴于此,国民党重组力量,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联合苏联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以党治政、以党治军的道路。国民党建立军队,力量迅速强大,但军权落入蒋介石手中。北伐军打败了孙传芳、吴佩孚等军阀,但是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清洗共产党

人,不少共产党员系身图国,牺牲于屠刀之下,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蒋介石继续率军北上,以张学良倒戈转向国民革命军为标志,国家得到暂时的形式上的统一。

新文学运动兴起,是以革除旧体诗为突破口,得到一大批激讲文化人的响应,白话文、新诗几乎成为革命的代名词,旧体诗被大多数人视为腐朽的骸骨。其实诗文革新运动早在清末已有先声,在此有必要追溯其背景。

十九世纪末,黄遵宪、梁启超等倡“诗界革命”,要求诗歌反映新时代、新意境,然而不废旧风格,即旧体诗形式、传统的格律声韵。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概括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所谓新意境指的是大量吸收西方新学说、新思想、新事物、新成就,以此融注于旧诗形式之中。就其实质而言,这是一个渐进的而非革命的过程。尽管他认为千余年来的诗词已堕落为溺忘的玩物,但他并未就诗歌形式提出过什么革新的主张。然承梁启超的诗文革新运动之余响,至民国初年,一批辛亥革命党人与南社诗人以横放杰出的作品,昭示着民主意识、革新意识已深入人心。由于封建社会以诗赋八股取士制度被取消,自清末以来即进行教育制度改革,不少优秀子弟通过各种途径出国留学;国内的大学不断创立,但知识阶层眼界大为开放,鉴于中国长期积弱、国势凌夷、内受专制荼毒、外受列强压迫的局面,一些思想激讲的知识分子对固有的传统文化产生怀疑,于是就有了新文学运动与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胡适、陈独秀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他们登高一呼,四方响应,青年学子,竞相趋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起初不过是意在改良,不免作了一些矫枉过正之言,也有不少片面武断之处:指千百年来的正统文学为死文学,白话文为活文学;还认为旧体诗桎梏情感,必要使作诗如作文。以为形式解放了,必能促成思想情感的自由抒发。刘半农则提出废除律诗、排律,保留绝句、古风、乐府(《我之文学改良观》),主张文言与白话可暂时处于对峙地位,为旧体诗留下一点地盘。

但大多数先驱们认为必须废文言改白话,第一个革命的目标便是旧体诗。陈独秀更明确提出“文学革命论”,于是文学渐进之途一变而为革旧布新了。为创建新体白话诗,激进的人们全盘否定旧体诗,不分形式内容,统统视为死文字、“孔家店”里的霉种妖孽,必欲铲尽而后快。在一个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年代,西方文化社会的一切当然显得比固有文化更为优越和进步。引进西方先进的一切,来改造中国的落后,是先驱者的共识。但这也导致了否定一切传统的思潮,诚如唐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所说:“当时的倡导者们对于自己民族的古典文学大多采取轻视甚至一概否定的态度,而把人们的视线完全引向西方。”传统学人与旧文人对此迷惘而无可奈何,哀叹“美雨欧风摧旧学,锦囊端合供花翁”(樊增祥《石遗作樊宗师歌案和次韵报之》);“欧化东行汉籍摧,可怜风雅尽荒芜”(李国瑜诗句)。一九二七年三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自沉北京颐和园昆明湖,震动学界,代表着—代传统学人也是杰出诗人的凋谢,诚如陈寅恪在挽诗中所说的“文化神州丧一身”。

为了大众掌握文化工具,提倡白话以自如地表达思想,原是无可厚非,但为了立,非得把旧体诗这种形式抛弃不可,则大有疑问。如果以理性的精神来扬弃传统文化包括旧体诗,也许不至于过于偏激,所以当时就有不少人如严复、章太炎、柳亚子等都在大声疾呼,反对割裂文化传统,对白话诗持怀疑态度。但柳亚子后来改变态度,拥护白话诗,于一九二三年与叶楚傖、陈望道、曹聚仁等发起成立新南社。又有以南京东南大学教授为主的学衡派,他们大多从美国留学归来,主张以中学为基础,会通西方学术,人称“会通派”,有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人。他们在《文学旬刊》上与新文化运动支持者展开争论,主张民族文化传统不可偏废,旧体诗不可革。一九二二年他们创办了《学衡》刊物作为阵地,与胡适等人的主张相抗衡。传统的国学研究与中西融汇之学是学衡派的主要学术特色。同时,他们

在《学衡》刊物上开辟“文苑”专栏,大量刊登旧体诗,除了黄侃、胡小石、汪东、王伯沆、胡翔冬等人外,不少是同光体赣派作者如陈三立、夏敬观、华焯、汪辟疆、王易等人,也有很多原南社社员胡先骕、梅光迪、诸宗元、叶玉森、吴梅、吴恭尹等人诗作,使此专栏成了江西诗派之绝响、南社社员之余音。此刊共出版七十九期。

由于用白话文取代文言取得了初步成功,新文艺样式如新诗、小说、戏剧等陆续登台,借助于现代传播媒介得以蓬勃发展。旧体诗骤被冷落与废弃,被鄙夷为过时之物。加上由于旧体诗讲格律,学古文,读古诗,习作者容易掌握,而推广白话文以后,前人不难掌握的格律却被年轻人视为畏途,诚如吴芳吉所说:“今之新人以其规律过严,视若累桎重囚。”(《白屋吴生诗稿自叙》)作旧诗者被讥为“迷恋骸骨”。钱敬文在晚年回忆往事时说:“我幼年即学作诗,稍后因新文化运动兴起,此事被认为迷恋骸骨,遂弃去改作新诗。”(《天风海楼室诗词钞自序》)旧体诗走入低谷,其生存环境与氛围趋于恶劣,影响急剧消退,日益滑向文化的边缘。很多人放弃了作旧体诗而改写新诗;有的人作了旧体诗,也不敢拿出来发表。即便像郭沫若这样的名人作旧体诗,也生怕受到人们的非难;他们的诗水平再高,也成不了人们的瞩目点、年轻人效法的榜样。旧体诗写作圈子萎缩,发表园地少,读者群锐减,诗人的地位也难得社会的承认,像古代李杜苏黄那样诗成一出、人争传之的局面难得一睹。对旧体诗命运,陈衍在一九二三年出版的《近代诗钞》序中哀叹:“身丁变雅变风,以迄于将废将亡。”吴宓也持悲观的看法,他在《空轩诗话》中说: